

权德舆研究

严国荣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权德舆研究

严国荣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权德舆研究/严国荣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9

ISBN 7 - 5004 - 5801 - 0

I. 权… II. 严… III. 权德舆 - 人物研究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5091 号

责任编辑 刘 兰

责任校对 郭 娟

封面设计 弓禾碧

技术设计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三河鑫鑫装订厂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6.375

插 页 2

字 数 165 千字

定 价 2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引 言

权德舆，字载之，唐德宗、宪宗时期的政治家、文学家。宪宗元和初年曾为相。他少负文名，广为交游问学，仕途通达，久据要津，或为宰执，或为藩侯，在极看重进士出身的唐代，他不是以应举入仕，而是以文名之盛应召入朝，并仕宦显达，入相封公。他在中唐时期文名颇盛，元稹称“元和以来，贞元而下，阁下主文之盟余二十矣”，被时人目为文坛盟主。他交游广泛，热心参与各类雅集及文学活动，与僧道隐逸、文士儒生、王公显宦均有交谊，并以诗唱和。他出入于早期古文家门下，与早期古文领袖弟子以文相会，并称誉他们的事业。他为人宽和，好扬人善，爱奖掖后进，三掌贡举期间，选拔了一大批精英才士。他为政忠君爱国，秉公持正，深受德宗信任，他正直善良，不偏不倚，鄙视奸佞小人，深受时人称赏。他的政治地位和文学声望对贞元、元和时期的政治和文化生活都曾有过很大影响。然而，到了后世，因为种种原因，他的声名渐为湮没，诗文流传也不广泛，对其诗文的研究也相对冷寂。这种时人的盛誉和后人的低调之间的巨大反差引起了笔者的浓厚兴趣，其时为20世纪90年代初，笔者正在南开大学攻读文学硕士学位，导师郝世峰先生开启我可以从这里切入，对权德舆有关问题作初步研究，写成学位论文。以权德舆为题的硕士论文完成后，感觉还是有些简略和肤浅，有的问题仍然长期萦于脑海而不得其解。2001年有幸考入马歌东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便就有关疑问求教于先生。先生以

日本对汉诗的“受容”、白居易诗歌在日本的传播为例来说明，描述和评价某位作家及作品，不妨让历史视野更纵深一些、宽广一些，或许能够得出更全面、更客观和令人信服的结论。并鼓励我可以在自己此前研究的基础上再作全面和深入研究，形成专论。正是在先生的启发和勉励下，笔者又广泛搜求资料，尤其再次仔细研读了权德舆的诗文。深深觉得，时人和后人对权氏评价的差异反映出的问题说明，除了时代风尚变迁和个人主观趣味差异的因素之外，肯定还有许多别的因素。当时人的盛誉和后人的低调实质上都有所偏失，而今人的评价和结论是建立在何种依据之上，则值得予以重新审视。我们应该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将权德舆放在中唐大历、贞元时期社会正经历制度、思想和风气的转型、变迁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从历史经验和常识出发，面对权德舆这样一位在贞元、元和政坛和文坛上有过重要影响的政治家、文学家。他有明确的诗文理论，创作有近四百首诗歌和四百多篇文章（论文中所引权德舆诗文，皆本自霍旭东校点之《权德舆诗集》和《权德舆文集》，故正文中不复注出。论文中所引其他作者诗文，除专门注出者外，皆本自《全唐诗》和《全唐文》，正文中亦不复注出），最早将“意”与“境”联系起来论述。他置身于古文运动中，改革科举考试内容，奖掖后进，为朝廷选拔了一批有志之士，这些人日后大多成为唐王朝的政治和文化精英。在当时，他被誉为文坛盟主。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我们都不能再忽视他的存在（此前事实上确实是忽视了），而有必要对其作较为全面、客观的梳理、描述、研究和分析。本书拟在把握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的前提下，通过对权德舆生平资料的搜求、考辨，感受其思想、心态、情感，阐释其诗文的思想和艺术价值，描述其作为政治家、文学家、文坛活动家的完整的风貌。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大历、贞元前后的历史文化背景	(1)
第一节 开天盛世的政治、文化遗产	(2)
一 儒学法统损毁 礼教纲纪松弛	(2)
二 唐王朝中央集权解纽, 地方分权强化	(5)
第二节 大历、贞元时期士人的政治及文化心态	(11)
一 回避、自适的苟安心理, 实用、世俗化的 生存态度	(11)
二 重建国家权威、思想权威和道德秩序的 强烈愿望	(25)
第二章 权德舆世系、生平与交游考	(37)
第一节 权德舆世系、家族	(37)
一 权德舆世系、家族	(37)
二 权德舆生年及侨居地	(45)
第二节 权德舆生平与交游考	(48)
一 肃宗乾元二年 (759) 至代宗大历十四年 (779), 寓居三吴, 读书游学时期	(48)
二 德宗建中元年 (780) 至贞元七年 (791), 入幕 淮南, 从事江西时期	(52)
三 贞元八年 (792) 至宪宗元和十三年 (818),	

入为朝官，出为藩侯时期	(64)
第三章 权德舆的思想渊源	(73)
第一节 权德舆生活时代的思想界	(73)
一 中唐文风变革前的思想界	(73)
二 权德舆思想的基本状况	(76)
第二节 权德舆的儒学思想渊源	(77)
一 秉承中庸思想，主张守正持中	(78)
二 主张正本清源，守经弃传	(80)
三 主张尊王削藩，严肃礼制	(81)
四 强调士人德行修养，主张整饬士风	(84)
五 主张贤能政治	(86)
六 主张为政宽和，轻徭薄赋，生人安民	(88)
第三节 权德舆和佛、道的渊源	(90)
一 权德舆周流于佛道的基本状况	(90)
二 权德舆同佛教的渊源	(91)
三 权德舆同道教的渊源	(99)
四 融合三教的思想倾向	(104)
第四章 权德舆文及文论研究	(108)
第一节 权德舆文章概述	(108)
一 权德舆文集的基本情况	(108)
二 权德舆文章简述	(111)
第二节 权德舆与古文运动	(120)
一 中唐复古思潮的文化心态及时代趋势	(120)
二 中唐文风过渡、变革期的古文理论	(125)
三 权德舆的文论主张	(132)
四 权德舆在古文运动中的作用	(141)
第五章 权德舆诗歌研究	(148)
第一节 权德舆与“意境”说	(148)

一 有关“意”、“境”、“象”的论述	(148)
二 权德輿与“意境”说	(159)
第二节 权德輿的诗歌创作	(166)
一 权氏诗歌创作的基本状况	(166)
二 权德輿诗歌的基本类型	(167)
三 权氏诗歌的主要内容及意义	(169)
结语	(188)

第一章 大历、贞元前后的 历史文化背景

762年，唐玄宗、唐肃宗相继辞世，太子李豫继位，是为代宗。763年，“安史之乱”结束。文学史上所称的中唐大历时期，即将揭开帷幕。

“安史之乱”的影响是深重的，史学家早就指出，它是唐朝历史的转折点，甚至可以说是整个中国古代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的直接后果就是把一个集权、强盛、稳定和辽阔的帝国变成了一个藩镇割据、党争不断、宦官专权、充满危机和分裂的国家。虽然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唐代历史可分为前后二期，而以玄宗的‘安史之乱’为其分界线”，但是，思想、文化、制度的演变却是一个漫长、渐进的过程，在它之前早已开始，且远未完成，这一过程正逻辑性地表现为大历至元和初的积弱、平庸，充满了过渡时期的社会特征。只是并不能说明这一过渡时期无关紧要，实际上，没有这一时期的蓄积、过渡，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元和中兴。而本书所要讨论的权德舆，身历肃、代、德、顺、宪宗五朝，正是这一过渡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学术和文学等制度、风气变迁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其父辈又是“安史之乱”后南迁的关陇士族，因此，有必要对这一过渡时期前后的社会文化背景作一简要回顾和描述。首先，远在开天盛世时就已发生的一些社会思想变化，在这一

时期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特征。

第一节 开天盛世的政治、文化遗产

一 儒学法统损毁 礼教纲纪松弛

如钱穆先生曾经指出，一项制度之创建，必先有创建该项制度之意识与精神^①，而各项制度之日趋崩溃（即某种意识与精神之丧失或转变不复存在），社会危机也就为期不远。

“安史之乱”极大地削弱了唐开国者所确立的李姓王朝的法统，其合法性和权威性遭到了地方割据势力的挑战。如历代统治者一样，唐初统治者对于被天下臣民认可自己正统地位的“法统”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喜好，并且以自己强大的实力、开放的胸怀、高度的自信以及包容的文化心态、宽松的思想气氛证明自己代表着天下的“理想、真理和正义”。政治、礼教文化，如教育、考试、贡举等制度的创设也都围绕着“法统”这一中心，以至于如唐太宗李世民喜不自胜地感叹“天下英雄，入吾彀中”。国家的制度、思想、文化、学术与文学都归于统一。但是，士人阶层在“家给户足，人无苦窳，四夷来同，海内晏然，虽有宏猷上略无所措，奇谋雄武无所奋，百余年间，生育长养，不知金鼓之声，烽燧之光，以至于老。故太平君子唯门调户选，征文射策，以取禄位……”^②的盛世气象中，忙着诠释“秩序”之好，夸赞盛世之盛，竞逐繁华骄奢，谋取禄位富贵，在贡举制度的挟裹下，逐渐失去了正义的立场、独立思考的意识和批判抗争的精神，挤在狭窄的应举仕途上。此时，传统经学已被

①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6月修订第3版。

② 《通典》卷15。

简化为只是用来应付考试而需记忆和背诵的教条，徒具形式和工具的意义，像烛火已熄的纸糊的红灯笼一样，通红亮堂，却是空壳一只。士人阶层已不能、也无暇对社会脉搏做出确切的诊断并对病变进行疗救。于是“知识作为筹码，思想成了装饰，语言成为游戏”^①。王道、经典、传统一方面被神圣化为人人必须遵奉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它又异化为应付考试而需背诵的教条。

科举制度使仕途及政治空前开放，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结构。由仕途晋身的新的阶层成为“外庭士大夫”，逐渐取代了原来的“关陇贵族”，成为社会政治的主要力量。科举考试促使教育越来越普及，知识世俗化。这种社会政治、文化，由贵族阶层把持到有平民阶层参与并日渐主导的变化趋势，消解着原来建立在等级、礼法基础上的王权法统和儒学思想的权威。而新兴的庶族士人阶层那种为人仕而科举，为科举而读书求知的实用功利目的，改变着学问的作用，也改变着世风、文风。其结果就是“物态浇漓，稔于世禄，以京兆为荣美，同华为利市，莫不去实务华，弃本逐末”^②。他们解构着以儒家传统礼法为基础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也就是说，庶族士人在王公贵族好文务华、以诗赋取士的好尚中，把传统经学厚加文饰，文学成为时尚，亦即笃实庄重的经学被文学化^③，思想被逐渐疏离、抽空，社会弥漫着奢华浮夸和非学术化的风气，在本质上，北方的“质”已被为南方的“文”所置换。

在社会环境日趋宽松、主流社会阶层日趋世俗化的同时，

①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

② 《唐摭言》卷1。

③ 李浩：《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1版。

佛教、道教侵蚀着正统儒学、礼教的领地，异教如摩尼教（大历初至元和间极盛于两京、河东、三吴、江西地区）、景教（唐人所称之基督教，在太宗至武宗灭佛以前，在内地广泛传播）^①、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也在中土传播。天长日久，浸积成习，人们逐渐习惯并接受了佛、道与儒教的协调、适应、融合。佛道也堂而皇之地进入贵族上层社会的生活和精神世界。禅宗的兴盛，更是极大地拉近了佛性与人性之间的距离，佛教作为信仰者的心灵归宿，精神指导师的意义消弭，它渐渐退化成了日常生活。宗教给予人的神秘、威严、彼岸世界的澄净、个人精神超越，被日常生活的平淡、凡俗、琐碎所替代。自然随缘的修习理念，模糊了宗教与世俗生活的界限。佛、道二教也成为消解儒学权威、礼教秩序的帮手，从思想本源上为中唐的世俗化、生活化提供了理论支持。

唐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华夷杂处，由来已久，更兼唐人不重视种族观念，“夷夏之防”的民族主义意识随着国家的空前强盛和有挑战性的强悍部族的衰亡瓦解而逐渐松懈甚至淡忘。李姓王朝的自信以及本身血统来源的差强人意，使得统治者提倡“夷夏一家”。边境藩镇初设之意，本来在于防止异族入侵，李林甫当政时，嫌忌仕进出身的内地士人以战功精进，尊宠妨己，乃上书请求任用藩将，所以诸道节度使大多出身于少数民族（如安禄山、哥舒翰、高仙芝等），他们所统领的藩镇的兵将也大多是胡人。最初设节度幕府是为了用兵防范边疆少数民族政权侵扰，其内在的警惕的民族意识应该说时刻在保持着，因而，“以夷制夷”，使用胡将胡兵，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完全是正当的、需要的和可以理解的。但随着国家的空前强盛，社

^① 《唐会要》卷49。

会对胡风的欣赏，骄傲之心渐生，警惕之意日淡，大量地使用胡将胡兵，最后酿成胡患，安禄山南下终于引爆社会总矛盾。对于唐王朝来说，自己正统文化包容性的负面因素显现了出来，即自己的包容、广纳的品格正削弱着王权的正统地位和权威性。而作为其正统文化主干的儒学礼教已经无法对世道人心进行规诫。

二 唐王朝中央集权解纽，地方分权强化

“安史之乱”平息后的政局，早已不是开、元时代的帝国盛世了，代宗是个平庸的君主，他统治下的唐王朝，内忧与外患交并，君臣却苟安弄权、不思进取。军权为内廷宦官所掌，先后有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等宦官权倾朝野，骄横跋扈。朝政常被一批奸臣所操控，先后有元载、王缙、杜鸿渐为相。元载为人奸险，王缙曲迎贪冒，杜鸿渐畏层少略，三人沆瀣一气，排斥异己。代宗本来就信佛，深受不空法师的影响，从不空那里受了灌顶戒，而元载、王缙等也以佞佛而讨代宗欢心，进而蒙蔽他，据《新唐书·王缙传》记载：“缙素奉佛，不茹荤食肉，晚节尤谨。妻死，以道政里第为佛祠，诸道节度、观察使来朝，必邀至其所，讽令出财佐营作。初，代宗喜祠祀，而未重浮屠法，每从容问所以然，缙与元载盛陈福业报应，帝意向之。繇是禁中祀佛，讽呗斋薰，号‘内道场’，引内沙门日百余，饌供珍滋，出入乘厩马，度支具禀给。或夷狄入寇，必合众沙门诵《护国仁王经》为禳厌，幸其去，则横加锡与，不知纪极。胡人官至卿监、封国公者，著籍禁省，势倾公王，群居赖宠，更相凌夺，凡京畿上田美产，多归浮屠。虽藏奸宿乱踵相逮，而帝终不悟，诏天下官司不得捶辱僧尼。初，五台山祠铸铜为瓦，金涂之，费亿万计。缙给中书符，遣浮屠数十辈行州县，敛巧

费货。缙为上言：‘国家庆祚灵长，福报所冯，虽时多难，无足道者。禄山、思明毒乱方煽，而皆有子祸，仆固怀恩临乱而踣，西戎内寇，未及击辄去，非人事也。’故帝信愈笃。七月望日，宫中造孟兰盆，缀饰鏤珩，设高祖以下七圣位，幡节、衣冠皆具，各以帝号识其幡，自禁内分诣道佛祠，铙吹鼓舞，奔走相属。是日立仗，百官班光顺门奉迎导从，岁以为常。群臣承风，皆言生死报应，故人事置而不修，大历政刑，日以堙陵，由缙与元载、杜鸿渐倡之也。”^①与此同时，局部内乱远未停息，代宗的心思在于恢复朝廷行政秩序，他无心也无力解决安史旧部的割据自专，任其盘结自固，所谓“多事之后，姑欲安人”^②。据《旧唐书·德宗纪》记载，大历年间，先后有李宝臣、李正己、田承嗣、梁崇义等方镇，各拥兵数万，心存疑贰，连衡盘结自固，中央朝廷一有攻城复地的信息，他们便马上修城缮甲，以防备朝廷。朝廷的姑息政策，使各地的大小军阀对割据自专都起觊觎之心。从大历元年起，先后有虢（guó）州庞充、泸州杨子琳、幽州朱希彩、湖南臧介、岭南哥舒晃、昭义裴志清、汴州李灵曜、淮西李希烈等乱臣贼子蜂起，战事频仍，军费庞大，财政吃紧，百姓不堪重负，斗米动辄千文。另一方面，外患不绝，吐蕃继陷陇右后，又不断蚕食西部州县。安史大乱后的唐王朝，已是残破的江山，动荡的时局，昏庸的政治。此时的士人注定要面对这种让人失望、迷惘的社会现实。

德宗的即位，仿佛闪现出一丝复兴的希望。德宗不是传统史籍里所载的刚愎自用、贪婪敛财、轻信多疑、柔弱好变的昏庸之主，而是一个颇想有所作为的君主。他一掌权，便想扭转

① 《新唐书·王缙传》。

② 《旧唐书·薛嵩传》。

代宗时代朝廷走下坡路的趋势。在他刚执政的前几个月里，就发了十几道诏旨，要求中央政府厉行节约，罢除朝廷及地方大员的奢侈用度，废止重税，罢除诸道的“进奉”和“贡献”，除掉宦官刘忠翼，以打击宦官的骄横，禁止朝廷参与建造寺庙，停止赞助度俗人为僧，诏王公卿士不得与民争利，加郭子仪尚父荣衔，令其退休，更重要的是实施“两税法”，仅实施当年的税收收入就等于上年中央财政收入的总和，这一切改革正是德宗革新政制的最初步骤，目的是为了恢复中央政府的主动性和权威，它仿佛显现出明显的改革气象和中兴趋势。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德宗很在意加强皇帝的直接权力，因而猜忌多疑也就在所难免，对杨炎、卢杞的相继任用，都是他直接控制朝廷权力的权术之一，据《旧唐书·韦渠牟传》记载，“陆贽免相后，上（德宗）躬亲庶政，不复委成宰相，庙堂备员，行文书而已”。^①其结果是朝廷纷争不断，政治恐怖气氛弥漫。与此同时，德宗恢复中央权威、限制藩镇权力的措施引起了各地藩镇的警惕和防备，建中二年（781），讨伐成德李惟岳引起了建中年间此起彼伏的藩镇叛乱，一直到贞元二年（786），李希烈被部下陈仙奇毒杀，这持续五年的叛乱才归于平息。这次动乱，彻底粉碎了德宗以武力恢复中央权威的梦想，它使中央政府国库空虚，威信扫地，唐朝廷不得不承认和接受中央权威已遭削弱和地方权力逐渐巩固这一现实，统一的财税体系被分割，朝廷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江南诸镇支撑。唐中央朝廷维持着形式上的统一，而实际上却与各地藩镇妥协，中央和地方力量在均衡的对峙中使政局相对安宁，天下渐次太平。虽然，由于德宗准备不足而仓促挑起收缩地方藩镇权力的讨伐

^① 《旧唐书》卷135。

战争最终以朝廷的失败而结束，使朝廷不得不行姑息之政，使中央企图重新控制各地藩镇的努力延迟了约三十年，也使德宗背上了无能的名声。但实质上，宪宗元和中兴采取强有力的政策所需要的制度手段以及财政、军事资源基本上已经具备，正应归功于德宗不事声张和坚持不懈的努力^①。

地方军事分权制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唐王朝的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运行方式。唐中央朝廷的政教、礼法、财税等制度被分割得只能在两京、剑南、山南和江南等地区完全实施。初唐时的府兵制，在唐王朝版图扩大、边疆其他部族不断内侵的背景下，越来越显得不适应帝国边防的需要。有效地维护帝国庞大的边境防御体系，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财政也供养得起的职业化军队以专司边防，成为唐王朝不得已的选择。于是，府兵制这种亦兵亦农、耕战结合的戍边屯守体制，不得不让位于更职业化的军事组织藩镇，亦即节度使制。这种集边境军事、行政、财政大权于一身的边境地方军政首长负责制于唐中央政府而言是一种军事分权制，于某一藩镇地区而言，是地方军事集权制。它固然保证了边境地方的稳定，但它自建立时就孕育着自专抗命、割据一方的危险，在“安史之乱”爆发后不久，这种原来只在边境地区设置的军事组织，也在中原地区的河南道设置了，并且，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它成为中唐以后，唐朝朝廷存在的行政和军事基础，直到唐亡。它带来的变化是不可估量的。

首先，唐王朝中央权威扫地，军人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力量，他们分割着国家的权力体系，操纵和改造着帝王的政

^① [英] 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 12 月第 1 版。

治生活和地方行政体系，一个新的利益集团形成。他们作为职业军人，地方观念强，但社会出身往往偏低，他们试图以政治上的强势牟取以前不曾有过的财富和社会威望。大多诗人们对此多有切身感受，且有诗为证。刘长卿《寄万州崔使君》云：“时难方用武，儒者任浮沉。”^① 诗人崔峒《送贺兰广赴选》云：“而今用武尔攻文，流辈干时独卧云。白发青袍趋会府，定应衡镜却惭君。”戎昱亦云：“细与知音说，攻文恐误人。”（《酬梁二十》）

其次，中央政府丧失了对河北及河南大部分的有效控制，它们几乎成了半自治性质的独立王国，与此相适应，长江、淮河流域地区（江汉、江淮、两浙、江西）成为朝廷税收的主要来源及维持王朝形式上统一的重要基础。

第三，唐王朝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藩镇割据，不仅是政治、军事割据，而且也是经济割据，藩镇不仅分割着原属于中央政府的财政、税收，也造成了区域间的不平衡，中央朝廷与各藩镇间的战争、各藩镇之间的纷争，使得朝廷和藩镇都不得不竭财养兵。竭财养兵不仅导致了均田制的破坏，也导致了以此为基础的租庸调制的破产，土地所有制的改变使土地朝有权势者手里集中，社会贫富分化严重，破产农民增加，民生凋敝，社会矛盾加剧，朝廷税收锐减，税制改革也迫在眉睫。

第四，社会文化水平普遍下降。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社会文化发展水平也不平衡，中央朝廷的文教礼法制度在中央权力能够达到的地方尚且能勉强维系和推行，但在各藩镇自专下的地区就大不相同了^②。在这种情势下，除了京师长安

① 《刘随州集》卷3，《四部丛刊》景明正德刊本。

②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6月修订第3版。